

嘉隆万改革视野下的海瑞

——对海瑞历史地位的重新诠释

田 澍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嘉隆万改革前后延续六十余年,是明代特有的改革模式。作为举人出身的海瑞成长于这一时代,大有作为于这一时代,既是嘉隆万改革的受益者,又是嘉隆万改革的积极参与者。不论在哪个职位上,海瑞都以改革为己任,兴利除弊,急国家之所急,忧民众之所忧,充分展示了他勇于变革、敢于担当的改革家气质。长期以来,人们仅仅把海瑞塑造成为奉公廉洁、刚正不阿的清官形象,而对他变革创新的改革家形象凸显不够,未能对他改革家的历史地位予以应有的重视。

[关键词] 嘉隆万改革;海瑞;一条鞭法

[中图分类号] K 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4)01-0057-05

海瑞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清官海瑞”是人们对海瑞的广泛认同。随着明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仅仅以清官视角来认知海瑞是有极大局限性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瑞研究最具影响力的成果莫过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但从黄仁宇将海瑞称之为“古怪的模范官僚”来看,他无法对海瑞的言行作出更加切合实际的评判。黄仁宇以后,海瑞研究非常薄弱,缺乏高水平成果。现以嘉隆万改革为视角,将“清官海瑞”上升为“改革家海瑞”,对海瑞的行为特点和历史地位作一新的诠释。

一、嘉隆万改革:认识海瑞的新视角

综观各类论著,大都以海瑞廉洁刚正为主线来观察海瑞和评说海瑞,极少有人结合海瑞的时代特点特别是嘉隆万改革背景来认知海瑞。

海瑞成长和活跃的舞台是嘉隆万时期。对这一时代,学界的看法迥然不同。相当一部分学者将海瑞所处的时代特别是嘉靖时代简单地描绘成黑暗腐败的时代,并以这样的时代为参照来审视海瑞。尽管长达四十五年的嘉靖时代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不能因此无视嘉靖革新。改革的时代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时代,正是明朝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初期体制的缺

陷,才需要改革。而能否从事变革,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核心要素就是要形成领导改革的中坚力量。综观有明一代,只有在永乐以后的正德、嘉靖之际出现了最佳变革的时机^①。武宗的暴亡绝嗣和“大礼议”的发生,使明朝出现了全面的人事更迭,承载旧时代的杨廷和集团的消亡和代表新兴势力的“大礼新贵”的崛起,昭示着明代政治的裂变和新时代的到来。为了巩固皇权和塑造自己的形象,从湖北成长起来的嘉靖皇帝更需要改革,更需要向积弊开刀,更需要向部分过时的体制挑战。海瑞出生于正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514年1月22日),嘉靖三年(1524年)钦定大礼议时海瑞已有十岁,两年后入私塾读书,正值嘉靖革新的关键时期。可以说,海瑞是沐浴着嘉靖革新之风成长起来的。

嘉靖革新的时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作为藩王出身的嘉靖皇帝,进入北京称帝后,被杨廷和等旧臣所轻视,被强迫改换父母,要由“小宗”变成“大宗”。对此不顾事实和无视孝心而强迫改换自己身份的作法,世宗大为不满,予以坚决抵制,最后赢得了胜利。世宗的胜利,打破了皇位继承中的身份限制,堂堂正正地以“小宗”身份合法继承皇位,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张璁等人以中下级官员的身份,与杨廷和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将其击败之后,在几年之间得到快速提

[收稿日期] 2013-12-15

[作者简介] 田澍(1964—),男,甘肃通渭人,历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史研究

拔，身居要职，主导政局，打破了长期形成的论资排辈的僵化局面，同样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世宗君臣的主导下，嘉靖前期倡行三途并用之法，打破重内轻外的格局^②，扭转了独重进士和偏重京官的不良习气。世宗认为：“夫三途并用，则无偏重，而人才有余，由是怀才抱德之士斯德显于世，非特求之文词之徒而已。今举人无九卿之望，岁贡禁方面之升，田野绝保举之路，有一员缺，必求进士出身者斯得推补，以致人尚浮词，不修实行，甚于修于家而坏于天子之庭。欲求为上为德，为下为民者，卒未易得也，今后着吏、礼二部即便考求祖宗以来旧典，备细开具，奏请定夺，务要科举、岁贡、荐举三途并举，但有真才实德者，不拘近年资格，一体不次擢用，庶忠义向风，浮薄改行，内外大小诸司各得其人，以为惠民致治之本。”^③在世宗和张璁等人的强力推行下，使独重进士和轻视地方官的风气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其对士风的积极影响是广泛而又深刻的。正如明代状元焦竑所论：张璁“久于科第，谙世故。得位，每事欲复祖宗旧制，行进士、举人、岁贡三途并进法，士风一变，人思奋庸，贤才辈出而无滞。”^④这正是海瑞成长的时代。

正是嘉靖时代打破了独重进士的局面，使海瑞在两次会试落第后，毅然放弃继续会试的打算，以举人身份进入仕途。他认为：“士君子由科目奋迹，皆得行志，奚必制科？”^⑤便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接受吏部任命，担任福建南平县儒学教谕，时年四十一岁。海瑞以地方教职为起点，就这样开始了自己“豪杰”般的政治生涯。在海瑞看来，只要自己在平凡的岗位上勇于进取，政绩显著，就能与进士出身者同样受到提拔和重用。海瑞仕途的发展路径，其实就是对嘉靖时期推行三途并用之法的集中显示和完整注解。他任职伊始，就制定《教约》，倡行实学之风。同时海瑞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以培养生员的“浩然之气”。当御史前来视察时，海瑞并未以身份卑微而在门外跪迎，而是依据嘉靖时重新完善的“宪纲”率领两位训导迎接。当御史出现时，两边的训导习惯性地下跪，唯独海瑞中立不跪，只作揖而已。来者责问海瑞：“此行者何等礼也？”海瑞答道：“宪纲礼”。由此便得了个“海笔架先生”的外号^⑥。海瑞是按照嘉靖六年（1527年）颁布的“宪纲七条”和嘉靖九年（1530年）颁发的“宪纲十二条”等相关规定^⑦行事的，可见他对朝廷革新措施相当熟知，且能严格遵守和创造性的执行，充

分说明海瑞是一个真正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合格官员。他能够认真践行朝廷政令，有的放矢，是官员中难得的真君子。“台谏不踞”的海瑞从此声名鹊起，赢得普遍赞誉。四年后，海瑞升任浙江淳安知县，任职五年后，又调任江西兴国知县。海瑞在地方基层任职十一年，能够“洁己爱民”，抗击权贵，造福民众，真正践行着朝廷对官员德行和事功的要求。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起，五十二岁的海瑞升任京官，先后任户部云南司主事、兵部武库司主事；又先后升任尚宝司司丞、大理寺右寺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调任通政司右通政；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在闲居十六年后，起用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旋改为南京吏部右侍郎，不久升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卒于任上，享年七十四岁。从“卑冷”之官的教谕开始，到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结束，海瑞永不停息的革新是嘉隆万改革大潮的缩影，他是明代举人的杰出代表。正如《明史》所言：“明世举于乡而至巡抚者，隆庆朝止海瑞，万历朝张守中、艾穆。”^⑧

二、海瑞：嘉隆万改革的践行者

综观海瑞的一生，他不论身居何职，都以除弊革新为己任。嘉隆万改革绝不是某一皇帝或某一阁臣的改革，而是上上下下相互配合、相互推进的改革。一项改革措施或许是朝廷的顶层设计，或许是地方官员或职能部门突破条条框框而被朝廷所认可的举措。只有朝廷和地方相互联动、相互启示，才能推进改革，确保改革的持续进行。到海瑞进入仕途时，明朝立国将届二百年，嘉靖革新已届三十年，一些革新举措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事变更逐渐流于形式或被官员遗忘；一些重大积弊仍在延续，无人敢碰，如宗室禄俸等问题^⑨；一些新问题不断涌现，需要清醒面对。在这一变革的时代，海瑞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在不同的岗位上竭尽全力，兴利除弊，试图通过革新和自身榜样构建“官不侵民，民不病官”^⑩和“百废具举，百弊划除”^⑪的社会，用毕生精力为嘉隆万改革增加亮丽色彩。

改革之难不在于出台一条又一条的革新之举，而在于如何具体落实革新计划。在信息不畅、道路阻隔的海瑞时代，官场中视朝中政令如儿戏是不难理解的，官员人心各异，不可能急朝廷之所急，而是各自为政，难与朝廷革新同步，致使革新之令在执行中大打折扣，甚至成为不法官吏剥民自肥的借口。如嘉靖前期对学校的整饬应该说采取了极有力

的措施，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但海瑞在南平时，发现人们依然轻视教职，“故居此官者，多媿媿不举其职，士习蠹而吏治偷”^②。海瑞到任后，将朝廷政令与南平实际结合起来，很快制订了《教约》十六条，全面整顿南平县的教学秩序。同时申明：“本职初至学中，某善可兴，某弊可革，尚未尽识，容与诸生会议，并参酌提学道教条别为更定。”^③从中可以看出，上任之初，海瑞就以改革为己任，具有强烈的革新意识。被人们所冷落的教谕一职，在海瑞的眼中，同样是从事改革的大舞台。在海瑞看来，只要有权有责，不论职位大小，都有改革的使命。海瑞用自己变革的行为展示了一位地方官特别是一位地方部门小官在嘉隆万改革大潮中所应扮演的角色。这应是认识海瑞的基本出发点。

在担任淳安和兴国知县期间，海瑞在新的职位上又积极顺应嘉靖时期一条鞭法改革潮流，在自己的辖区之内尽可能兴利除弊，推行赋役制度改革，造福民众。在淳安时，海瑞“清查六房积弊，一切陋规严行革除。其有益地方者无不为之。凡劝赈贷、谕里老、禁馈送、止矿徒，广为告示，雷厉风行，吏治肃清。而尤以清丈民田，严饬大户为急。”^④他在淳安颁布的《兴革条例》和在兴国颁布的《兴国八议》等都是嘉隆万改革时期县级改革的宣言书，此时的海瑞当然是县级改革的典型代表。如果说嘉靖时期应天巡抚欧阳铎、广东巡抚潘季驯、浙江巡抚庞尚鹏等人是省区一级探索赋役制度的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海瑞则是当时县域一级尝试赋役制度改革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为一条鞭法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样本和经验。

海瑞的地方任职，使他更加了解地方政情和民情，这是担任京官难得的经历。这种经历也是嘉靖革新所提倡和重视的。嘉靖七年（1528年），吏部尚书桂萼上疏认为：“州县正官于民最亲，今选途大隘，各处有缺，率多挨次除补，此所以不得实才，而小民之困不可救也。”^⑤如果京官被那些不谙地方政情和只会舞文弄墨之流所把持，政治之阻塞和民众之怨愤就不可避免。只有确保操守清廉和政绩突出的地方官员的升迁渠道，才能确保统治阶级的活力。这是世宗君臣的共识，在他们的推动下，嘉靖时期此风得到了较好的弘扬和切实的执行。海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地方官较快地进入京官序列的。在升任右佥都御史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十府时，他根据自己在南平、淳安、兴国等地了解的情况和改革的经验，并针对江南富庶之区的

实情，先后制订了《督抚条约》和《续行条约册式》，在江南开始了更大范围的改革。在海瑞严厉的督促下，相关规定得到了认真的落实，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海瑞在南京的改革，主要在于“斥黜贪墨，搏击豪强，矫革浮淫，厘清宿弊。令既严布，飙发雷厉，郡县官吏凜凜竞饬，贪污者望风解印而去。权豪势官，敛迹屏息，至移他省避之。有显者朱丹其门以居，闻公明日将至，一夜遂易而黜。监造中贵某，素骄横侈纵，出入肩舆八人，骑从甚都。一日见公，即内愧贬损，不能自安，所用肩舆，遂减其半。其政治精明，严厉成效如此。”^⑥

但是，海瑞的改革不可能如此平顺，他所遇到的难题和强大阻力，一方面是对海瑞的考验，另一方面又是对朝中重臣的检验。面对江南地区异常严重的土地兼并，海瑞认为要缓解社会矛盾，豪绅必须将强占的田地归还小民。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海瑞便向江南最大的官绅、原首辅徐阶家族开刀。在海瑞的弹压下，广占田地的徐阶退了极少部分以应付海瑞。但海瑞认为退田太少，要求再退。因海瑞在江南改革强度极大，他在江南攻艰克难的局部改革便因各方反对而不到一年被中止。当时的内阁首辅是高拱，随后张居正接任，这两位被一些人描绘成典型的改革家，但正是他们两位特别是张居正的作祟，海瑞被罢官且十多年不被起用。也正是由于张居正对徐阶的保护，才使“富堪敌国”的徐阶“五世其昌”，成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望族。^⑦正如黄仁宇所言：“如果不是张居正的援手，徐阶本人都会难于幸免。”^⑧

尽管海瑞因改革触动江南富户利益而得不到朝廷支持被罢官，但闲居的海瑞仍然关注时政，心系天下，“遇有当道咨询民瘼及行政得失，必侃侃条陈，毫无讳忌，耻为面谀，罔及其私。”^⑨同时，海瑞指导海南各县清丈田地，并编写《拟丈田则例》和绘制图样，提出了因地制宜的多种丈田之法，将自己多年的改革经验创造性地带给了海南，确保了海南地区清丈工作的顺利进行。

万历十三年（1585年），在反对张居正的浪潮中，被高拱和张居正遗弃的海瑞又被神宗重新起用，时年七十二岁。在南京吏部右侍郎署吏部事任上，海瑞改革之心依旧，到任后即刻颁布《禁革积弊告示》，整顿南京官场秩序。海瑞告知百姓：“不可做刁顽不听法度的百姓”，“亦不可做软弱听人打、听人杀而不言的百姓”。同时警告百官，办事不得收礼，各衙门不得赠礼，禁止一切“彼酬此

答”^②。

总之，海瑞的一生是改革的一生，清官涵盖不了他的改革活动和变革精神。只要一息尚存，一有机会，在任何职位上和任何环境下，海瑞不仅敢于挑战潜规则，不随波逐流，而且改革不止，勇往直前，是嘉隆万改革的真正践行者。

三、清廉刚正：海瑞反腐自保的法宝

在中国古代社会，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以修身、齐家的道德标准和自律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目标。但一旦进入仕途，大多数人难以做到洁身自好，贪贿之风便成为官场常态。黄仁宇之所以把海瑞称之为“古怪的模范官僚”，就在于说明像海瑞一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但清廉是做官的基本要求，而不是作官的目的。海瑞之所以以举人身份崭露头角，敢于改革，就在于他的充分自信。这种自信，一方面来自于他的清正廉洁，另一方面来自他的勇于担当。言行一致、兴利除弊和切实地执行命令贯穿于他的一生。海瑞因改革而得罪了不少人，但他能够善终，且能得到有良知者的永远敬重，就在于他忠于国家，爱护百姓，不计私利，“不畏死，不爱钱，不立党”^③，怀抱“救世拯民之苦心，遇危难而不惊，处毁谤而愈厉”^④。改革就是利益的调整，必定要触及人的利益。不论身居何职，不论改革涉及多大范围，主持改革者必须以清廉自守，否则，后果必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或者说，自己就没有资格领导改革。改革就是要碰硬，解决难题，这就要求改革者自身首先要硬。海瑞用自己的近乎极限的廉洁和所向披靡的改革行为集中诠释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任何改革都需要现有的官僚队伍来执行，而改革最直接触及利益的也是官僚队伍。换言之，治官是改革的第一要务。从地方官升至户部云南司主事一年后，海瑞认为百官既贪贿成风，又不思进取，要让这样的官僚队伍实现治世是不可能的。在忧愤之余，海瑞上疏直抒胸臆，对皇帝和百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陛下误举，诸臣误顺，无一人为陛下正言焉……官有职掌，先年职守之正、职守之全而未之行，今日职守之废，职守之苟且因循，不认真、不尽法而自以为是……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⑤此疏被人们广泛传播，称为“海瑞骂皇帝”。但过于渲染“骂皇帝”则是偏颇的。其实此疏是海瑞对整个官僚队伍的抨击。众

所周知，嘉靖皇帝是海瑞上《治安疏》时明代在位最久的皇帝，他因身体原因早就有退位的想法，但因制度不允许而未能如愿。在看到海瑞此疏时，嘉靖皇帝在震怒之余，也认为其言之有理，便又有“内禅”之意。嘉靖革新因世宗在位太久难免有停滞之状，海瑞对嘉靖后半期的政治表现极为不满，认为“二十余年不上朝，纲纪弛矣”^⑥，则是基本符合实际的。黄仁宇认为海瑞“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于说他这几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尸位素餐”^⑦是错误的，不符合海瑞上疏的本意。不论海瑞所言是否客观，其振聋发聩的声音对统治者应具有惊醒作用。就海瑞个人而言，他敢于批评皇帝和百官，就在于他个人的自信，即廉洁的自信和动机的自信。读着《治安疏》，人们不应当误读海瑞的用心。如果仅仅认为海瑞只“骂皇帝”而与百官无关，一味地借海瑞之言嘲笑嘉靖皇帝，则是对《治安疏》的严重误读！通过“骂皇帝”来警省百官，强国富民，应该是海瑞的真正动机。正如海瑞所言：“内外臣工，其官守，其言责，皆所以奠陛下家而磐石之也……敦本行以端士习，止上纳以清仕途，久任吏将以责成功，练选军士以免召募，驱缙黄游食使归四民，责府州县兼举富教，使成礼俗，复屯盐本色以裕边储，均田赋丁差以苏困敝，举天下官之侵渔，将之怯懦，吏之为奸，刑之无少姑息焉。”^⑧

如果说《治安疏》还未惊醒百官的话，那么，二十年后海瑞提出按照洪武祖制对贪腐者施以严刑峻法，则引起了官场的巨大震动。万历十四年（1586年），时年七十三岁的海瑞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身份上疏《一日治安天下事》，认为贪风盛行，在于惩治贪官污吏的刑罚过轻，主张重典惩贪，恢复朱元璋时代的“剥皮实草”和“枉法八十贯绞之”等刑典^⑨。作为垂垂老矣的海瑞，此时提出这样的主张，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协于公论”和“迂拙”。《明史·海瑞传》也认为海瑞“劝帝虐刑，时议以为非。”可见，治理贪贿之风有多么困难！海瑞一生与“乡愿”作斗争，但最终无法突破“乡愿”的藩篱。海瑞临终前用“剥皮实草”和“枉法八十贯绞之”的呐喊为明王朝敲响了最后的警钟！在明代，也只有海瑞能有这样的呐喊！在海瑞之后，再无人敢进如此忠言了！

海瑞“独行敢言”，其一生之所以敢向各种势力作斗争，就在于他是一位干干净净的官员，一位清清白白的官员，一位按照圣贤所倡导的完美人格

规范自己的官员。他忠于国家，“爱民如子，视钱如仇”^⑧，反对者无法从他身上找到打倒或丑化的任何借口。在他闲居时，“上宪每忌之，令巡按御史廉察其所为。御史至山中视之，公设鸡黍对食，居舍萧然，甚于寒素。御史叹息而去，无隙可寻。”^⑨自身不洁的张居正惧怕海瑞，终生不敢起用海瑞。而张居正死后遭受清算，为清议所不容，自身不正是主要原因之一。海瑞用自身的至清至纯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刻画了中国历史上清官、善臣、直臣、能臣和改革者五位一体的独特形象。其“行为国栋，德足世议，惠以达名，介而远利”^⑩，为“当朝伟人，万世瞻仰”^⑪，无人能够比拟。

吴晗曾经就海瑞的一生做过以下精辟的概述：“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反对坏人坏事；肯定、歌颂他一生反对贪污，反对奢侈浪费，反对乡愿；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不向困难低头，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言行一致，里外如一的实践精神。”^⑫根据以上论述，最后应加一句：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以革新除弊为己任，敢于创新，勇于实践的改革精神。事实上，海瑞并不“古怪”，“古怪”的是当时明朝的官场！海瑞的廉介刚正和革新不止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宝贵的财富。

[注 释]

- ① 参见田澍：《嘉靖前期改革条件的生成》，《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1期。
- ② 参见田澍：《双向流动：嘉靖前期的人事制度改革》，《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3期。
- ③ 《明世宗实录》卷119，嘉靖九年十一月己酉。
- ④ 焦竑：《玉堂丛语》卷6《事例》。
- ⑤ 《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80页。
- ⑥ 《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51页。
- ⑦ 参见田澍：《嘉靖前期监察制度改革述论》，《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 ⑧ 《明史》卷261《邱永嘉传》。
- ⑨ 参见田澍：《嘉靖革新视野下的张居正》，《学术月刊》2012年第6期。
- ⑩ 《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98页。
- ⑪ 《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1页。
- ⑫ 《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50页。
- ⑬ 《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页。
- ⑭ 《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84页。
- ⑮ 《太傅桂文襄公奏议》卷3《修省十二疏》。
- ⑯ 《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90—591页。
- ⑰ 参见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113页。
- ⑱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9页。
- ⑲ 《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94页。
- ⑳ 《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9页。
- ㉑ 《国榷》卷74，万历十五年十月辛未。
- ㉒ 《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03页。
- ㉓ 《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8—221页。
- ㉔ 《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8页。
- ㉕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38—139页。
- ㉖ 《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9—221页。
- ㉗ 《明神宗实录》卷171，万历十四年二月甲申。
- ㉘ 《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51页。
- ㉙ 《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94页。
- ㉚ 《国榷》卷74，万历十五年十月辛未。
- ㉛ 《明神宗实录》卷176，万历十四年七月乙卯。
- ㉜ 《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页。

On Hai Rui's Historical Status from Perspective of Jialongwan Innovation

TIAN Shu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PRC)

[Abstract] Jianlongwan innovation had lasted almost 60 years with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Ming Dynasty. As a Juren in that period, Hai Rui not only benefited from, but also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innovation. For a long time, Hai Rui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honest and upright official, but his innovative image has been ignored. Thus, it is necessary and significant to re-evaluate his historical status.

[Key words] Jianlongwan innovation; Hai Rui; Yi Tiao Bian Fa

(责任编辑 胡小鹏/校对 古跃)